

宗匠陶钧：红山文化之陶器（下）

◎王升



四、小河沿文化陶器

小河沿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非常丰富，有其独特性，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陶器分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夹砂陶可细分为夹砂灰陶、夹砂红陶、夹砂褐陶、夹砂黑陶；泥质陶可分为泥质红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夹砂陶和泥质红陶数量最多。夹砂陶质地疏松，需更加细心呵护，但由于成本较低，仍是生活中使用的陶器。泥质红陶也掺杂一定数量的细砂粒，陶质较细腻。

陶器器形以罐、钵、盆、豆、壶、尊等为基本器类。筒形罐是小河沿文化中发掘数量最多的器类，相比红山文化筒形罐体形略小，各遗址出土筒形罐器形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常有对称的双耳或环耳等附加物。壶类等器物以及部分钵、盆、盂类也有双耳。豆形器是这

一时期新的器类，它融盘、钵、盆的特点于一体，形成了各类豆形器，如钵式盘豆、盆式盘豆、折腹盆式盘豆等复合式豆形器。还有其他的融合类器物，如大南沟的侈口盆等。筒形罐罐身分为两部分，上部分直而渐深，折角后斜直渐短，后来这种罐类成为典型的孟形器。筒形罐也发展成为大口深腹罐。

小河沿文化陶器纹饰继承了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基本特点。“之”字纹仍是其特点之一，压（拍）印纹、刻划纹、戳点纹、附加堆纹仍是重要种类。但是纹饰仍有其独特性或创新性，出现了绳纹和雷纹等。绳纹主要用在筒形罐上，雷纹出现在彩陶上。

从陶器角度来看，小河沿文化更多承袭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筒形罐，但在小河沿文化和赵宝沟文化中两者共性鲜明：均较矮胖，腹腔较浅。另外，两者都有典型的陶器——陶尊。当然，小河沿文化也受到了红山文化的重要影响，甚至吸收了长城一带中原地区文化的某些因素。

五、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陶器制作水平进一步提高。在陶

器制作方法上，除了承袭传统的泥圈套接法外，轮制和模制也成为重要的制作方法。

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陶器类型丰富，有鬲、尊、盆、罐、鼎、盘、豆、爵等。其中深腹腔的筒状鬲、折腹尊等较有特点，筒状鬲为典型器物，富有特色，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容器最突出的特点是出现了三足器，该器物制作工艺复杂，是这一时期技术先进的形态。

陶器以灰色陶为主，火候较高。有的是素面，有的是彩陶。彩陶上有各种纹饰，如绳纹、链条形云纹、柳钉状的附加堆纹等。有的纹饰与黄河流域青铜器纹饰相似。彩陶图案纹饰色彩鲜明，运用红、白两种颜色。白色颜料可能是石灰石（CaCO₃），红色可能是朱砂（HgS）等原料做成。

彩陶器多发掘于墓葬中，不同的墓葬中陶器质量不同，彩绘的质量也不同。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中，发掘出土1600多件陶器，彩陶器占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有300多件彩陶器保存较好，颜色仍较新。彩陶上的颜色即使浸在水中或乙醇中也不容易脱落。

陶器纹饰集中在两个部位，一个是在陶器的腹部，彩绘的部分主要在陶器的腹间，这是最先进入人的视野的部位，也是彩绘者容易发挥才华的位置。另一个是在陶器的边缘部位，如口沿部、容器盖子、颈、足部等。纹饰图案以动物、植物及其他自然现象如云等为题材，形成了兽面纹、龙凤纹、禾苗、花卉及勾云纹等。

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纹饰继承了前面几种文化的元素并有所创新，成为我国传统纹饰样式的典型，龙纹、凤纹、兽面纹、云纹、花叶纹饰等为我国传统文化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基因。

通过这几类纹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已经在人们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表明这一时期应属于农耕时代。另外，通过将夏家店文化陶器纹饰与商朝时期纹饰对比，发现其纹饰特征有许多相同的元素，如兽面纹饰等。



由此推测，也许夏家店文化时期的先人，向南迁移，成为了商代的先民。（二十一）



史话绝代之精技 《卓歇图》



《卓歇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卓歇，是立帐休息的意思，这幅画描绘了契丹可汗出猎、歇息、宴饮的场景，可汗的妻子坐于地毯之上，男女使从分立两侧，前面还有跪地敬酒者、献花者、舞蹈者，另有许多骑士，或立或坐等待着支起帐篷，马上的狩猎物还未卸下，骑士们或聚或散，画家把歇息与乐舞两部分有机地结合，充分地显示了胡瓌的处理，画作中大场面中人马动于舞、聚与散的超高能力。

作者胡瓌，是五代时期后唐画家，山后乌索固部族，契丹人，他擅长画北方游牧民族的狩猎放牧，《卓歇图》描绘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狩猎放牧的生活场景，图中有人物37人，马匹24匹。《卓歇图》富有契丹族生活气息，笔法精密，色彩沉着，清劲有力，胡瓌善画番马，形神兼备赋予精神，握笔落墨细入毫芒，他在北方游牧民族占有重要地位，传至清朝被收入乾隆皇家内府，乾隆皇帝在画作上有趣跋“神完景尚”四字。

长卷采用散点透视，视点像电

影镜头似的自由移动着，能够表现出自然连续的、使人可以逐步欣赏的丰富内容。但画家处理得错落有致、疏密跌宕，又有条不紊、浑然一体。“虽繁复细巧，而用笔清劲”，不仅将人物的各形神传达得恰到好处，而且也表现出不同衣服的材质。这种笔法与中原地区的绘画存在许多近似之处，体现着各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卓歇图》的笔墨技巧相当熟练，线条勾画精细准确，运笔轻松自如。画马所用线条“握笔落墨，细入毫芒，而器度精神，富有筋骨”（《五代名画补遗》）。刻画马的形体结构夸张而准确生动。敷色多用矿物质、青颜料，浓重稳实。

《卓歇图》是一幅风俗画，或许我们可以说它体现了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画派特点，也为我国各民族人们所喜爱，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见证，通过这一画作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值得珍视的绝代之精技。

记者于红璇 通讯员王杰



玉兰花开了 谢小胖摄

拓宽突破和创新的路径

——品读《松漠华章：辽朝社会史专题研究》

◎张启民

研究：一是辽朝社会文化专题，以契丹、辽朝历史文化和辽朝城镇为中心展开论述，聚焦多元融汇下的辽朝社会；二是辽朝礼制文化专题，系统分析了辽朝礼典编修、柴册礼、再生礼、人鬻礼、国家养老制度、官员谥号赠赐，建构起辽朝礼制文化框架；三是辽朝捺钵文化专题，以捺钵史料检讨为依托，全面讨论捺钵在辽朝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由此折射出的辽朝政治文化特征。同时对契丹文字研究以及契丹学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与反思。

具体而言，该书研究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拓宽了辽朝社会史研究的路径。在辽代历史研究中，社会史是一个既有研究难度，同时又最难加以评价的领域。在对辽朝社会史进行研究时，如何不流于罗列且多有兼顾，成为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和难题。该书根据辽史研究的现状，从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角度出发，兼顾历史文化发展演变、典章制度、政治制度，由点及面，从国家礼制建构到社会管控，从民族起源到风俗习惯，兼容并蓄，因此而触及对社会史的看法背后的深层原因（即问题意识不同），并给予充分的论述，实现了从宏观研究向微观研究、从单纯的史学研究向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互补研究的转变，以社会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化史、政治史、制度史，带动了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从而使辽朝社会史研究的角度有所突破，拓宽了辽朝社会史研究的路径。

推动了契丹历史文化、辽朝城镇、典章制度以及捺钵研究的新进展。北

方长城地带最晚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成为沟通东西，连接南北的交通枢纽，此后一直延续这一发展轨道。在这样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东、西方文化因素融入契丹辽文化之中，从而形成了兼具东西、融汇南北的北方社会文化。从辽太祖阿保机“依唐州县置城”始，辽朝在地方上开始了大规模州县制推行过程，至辽圣宗开泰年间，历时百余年，辽朝最终形成了以五京为中心的地方州县行政区划体系格局。

在辽朝快速推行州县制的同时，以西辽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草原也开始了草原城市化过程。本书对辽朝城镇进行了分类和分析，论证了多元融汇下，辽朝时期的城镇所具有的契丹文化和汉文化双重文化因素的有机融合。有辽一代，统治者在契丹民族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原政权制度不同程度的吸收，并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其进行改造、创新，创造性地建构了“与汉仪杂就之”的礼仪制度，兼收并蓄，广采博取，在绵延数百年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融汇多元文化的典章制度。

本书通过追溯辽朝礼典编修的历程、探析柴册礼的仪式建构及其所包含的精神旨趣、考察分析再生礼源起、发展、意义、探讨辽太宗引进“人鬻礼”实践的政治意涵、分析辽朝时期国家养老制度的特点及影响以及辽朝时期官员谥号赠赐的具体情况，深化了对辽代社会文化的理解。对辽代捺钵问题的研究向来受到海内外辽史研究者的重视。本书从捺钵史料的检讨为出发点，广泛地搜括现有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

在深入分析、充分利用多种材料进行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对辽朝捺钵营地的建置与构造进行分析，基本搞清捺钵营地的实际状况，并由此折射出作为高度杂糅中原政治和北方游牧传统的辽朝政治文化特征。同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捺钵在辽朝政治中的作用及影响进行了系统地分析，为辽代政治制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探讨“存”字当作“思念”讲。如《诗经·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也就是说，知己之间互相思念，客观上的“天涯”也可化作心中的“比邻”。

可以说，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就是因为不同年代、不同族群、不同政权恰逢其时地创造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这也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形成、发展的巨大动力之一。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契丹历史文化、辽朝城镇、礼制文化和捺钵文化是中国古代北方游牧式政权体制的反映，以之为视角进行辽朝社会史研究，有助于重新审视辽朝政治、文化制度，是深入拓展游牧政权体制研究的一大途径，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制度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鲜活的案例支撑。书中许多论点乃发人所未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